

4G时代,电信业谁主沉浮

4日下午,工信部宣布,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颁发“LTE/第四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TD-LTE)”经营许可。这意味着,中国的移动通信正式进入4G时代。所谓4G,是第四代移动通信及其技术的简称。与前三代相比,4G拥有更快的传输速度,更宽的网络频谱,更好兼容性,更高的通信质量等一系列优点。4G牌照的发布标志着4G时代的到来,它不但意味着更快的移动网络速度,首先其冲的是或将改变电信业的现有竞争格局。在2G时代,中国移动一家独大,3G时代,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利用各自的3G牌照优势从中移动撬走大量用户。4G时代的到来,则使中国移动落后于后发优势,更少的3G包

被与更早的给力4G,使中国移动在4G比赛中处于抢跑位置。由于在3G时代投入较少,使得中国移动能够大力建设4G网络。根据媒体报道,中国移动今年总共投资417亿元,建设了约有20万个TD-LTE基站。相比之下,3G网络更成熟的中联和中信则缺乏这种动力。而这一客观现实也说明,中国电信网络的全面4G化,依旧存在利益上的阻力。对于中国蓬勃兴起的移动互联网业来说,4G牌照的发放,意味着重大的利好。在4G之前,由于移动网速瓶颈,很多新技术、新产品并不能完全推向市场,但4G之后,手机视频、手游、3D导航等适用于大带宽移动网络下的应用将会成为现实,或将催生新一轮投资潮与创业潮。

作为使用者,中国的电信用户未来一定会在4G网络的普及中受益,但从短期看,却还无法直接从4G牌照的发放中获得好处。因为从4G牌照的发放,到4G网络的大规模建成,还有相当一段时间需要等待,另外,在终端上,市场也没有做好相应准备,目前国内市场上的手机,大多数并不支持4G标准,而上4G一定要换支持4G网络的手机。有一部分海外入境的手机或许支持4G标准,但因为FDD-LTE在全世界更为普遍,支持TD-LTE标准的更少。4G时代固然值得期待,但要让消费者广为接受,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是资费问题,由于4G建网投入巨大,运营商

很难推出比3G时代优惠太多的数据流量资费标准。而因为4G网速比3G要快,消费者上网时消耗的流量会更多,未来,4G的资费标准降下来,市场才会更大。其次,就是4G的真实网速能否有充分的技术保障。现在有许多报道称,4G网速可以达到3G的10倍以上,下载一部高清电影,只需要几分钟……报道可能是一种事实,但却是实验室里一个基站对一台工程机条件下的事实。在真实的网络环境下,如果4G速度不比3G速度快那么多,肯定也会影响市场。4G牌照发放之后,谁能分得最大的一块蛋糕,关键还是要看,各运营商能够给消费者提供怎样的服务。网络又快、又便宜,永远是制胜的王道。 信海光

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策划的2012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今日公布结果,上海中学生再度高居榜首。但同时,上海学生也以平均每周花13.8小时做作业的“纪录”,成为“课业负担”项的第一名。(12月4日《人民日报》)

能力与负担皆为第一 不是双赢的理想成绩

PISA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行的评价15岁学生阅读、数学、科学能力的项目,主要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义务教育末期学生在日后的社会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公布的结果显示,上海学生在数学方面表现极为出色,平均成绩613分,86.8%的学生达到或超过了OECD平均成绩(494分)。在阅读和科学素养方面,上海学生以平均成绩570分位居阅读类第一名,上海科学平均分为580分,也位居第一。

取得傲人成绩的背后,上海学生也付出了平均每周作业时间13.8小时、位居全球第一的代价,超出了OECD平均作业时间7小时近一倍。据分析,上海学生校内上课时间平均每周28.2小时,排在第九位,在课外时间,学生要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以及私人家教等其他学习任务。

看到这样的“双重成绩”,让人怎么样也无法真正从心底里高兴起来。一方面,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中国基础教育的质量,对我们的教育更有信心;另一方面,这种用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方式换来的成绩真的是我们的教育追求吗?

这张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中国基础教育的努力和改观,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领先于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等。但是,相比过重的“课业负担”也在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一个双赢的理想成绩,减负依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学生聪明勤奋一直为世界所公认,但应能力较强、创新能力不足也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这不禁又让我们联想到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道关于中国教育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虽然非常沉重,却不容我们回避。在教育问题上,我们不能追求用不健康的方式来换取花哨的成绩。教育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所学,而在于所用,不在于一朝一夕,而在于久久为功,所以要少走弯路、老路,否则深受其害的还是我们自己。

在学习上,态度主动还是被动有着云泥之别,直接影响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过重的“课业负担”挤压了学生追求兴趣爱好的时间,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让学生在兴趣的指引下,自然、轻松、愉快地参加测试,或许成绩会更好,至少会更健康。 宋华

国企车补5300元 是在污名化“车改”

据报道,陕西国企西安经发集团今年调整车补制度,正取最高每个月可以享受5300元的补贴,而2013年西安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150元,只是车补一项就是全市最低工资标准的近5倍。企业负责人说:“高多少,或者低多少,国家没规定,这个事我们也在关注。”

国企和政府机关性质不同,其负责人的用车需求和官员未必一样,但国企属性,决定了其车补应参照对党政机关的规定。每月5300元的补贴,委实高得有点离谱,这是根据什么标准制定的呢?企业负责人的一句话很耐人寻味——“比原来节约很多”。言外之意,是和原来“自由用车”的状况对比,而不是依据实际用车需求。

这是一种值得警惕的“车改”思路。车改之所以必要,在于过往的奢靡腐败现象过于严重,改革就是要刮骨疗伤,而不是从“公车浪费”到“滥发补贴”的置换。原来花100元,改革后花90元,看起来虽然节省了,但这只是伪车改,是把原来还遮遮掩掩的腐败合法化。

前不久出台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提到取消一般公车,“适度”发放公务用车补贴。当时舆论就呼吁,防止“适度”成为一些地方借车补之名滥发福利的借口。现在看来这并非杞人忧天。若把对“适度”的裁量权留给各机构和单位,想剥离原来的既得利益,难。

实质上,车补,顾名思义就是用车补助。不论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如何,也不管是政府机关还是国企事业单位,起码要明确“实报实销”的原则。不依据当地薪酬水平、交通成本、用车频次等,随意提高额度,属于滥发福利,客观上会把“车改”污名化。

西安该国企将“国家没规定”当挡箭牌,这也给公共治理提了个醒:什么是“适度”,不能让某些部门、机构自由裁量,解释权归其所有,而应从制度层面确立更明晰的细化标准。否则,可能旧病未除又添新弊,“滥发补贴”或成为一个新的“改革难题”。 敬一山



某机构

据报道,近来,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一些经营不善的网吧,接到该区文化局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的口头警告,如再不交纳拖欠的罚款,有可能被关门。记者获悉,这个编制只有8个单位的单位实有54人上班,近70人在册领工资。(《西安晚报》) 吴之如图

陪球陪得副县级,该反思什么

近日,四川雅安市委原书记徐孟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被立案调查了。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徐孟加酷爱打乒乓球,曾将当地血站的一名女性工作人员长期留作陪练,后把该女陪练提拔成了副县级官员。

“这位女性不仅球打得很好,而且很受徐的喜爱”,这话很含蓄,因为性别的关系,更像是“徐三多”的称号,给人别样的联想空间。这样的揣测未必正确,但撇开这层联想,一个血站女性工作人员,在现实的官场格局中,能在短短几年内一跃成为副县级官员,有多大可能性?

报道没指出这位副县级官员的名字,也没披露她的升迁图,但估计再怎么不能进光不能透的,因为一旦权力抱成了团,惟一把手是从,惟官员团体的利益是图,它就是一座坚固的权力堡垒。

在这样的堡垒之内,“家长”相中的,自然只要一句话,相关部门赶紧为准提拔者铺平“程序”的红地毯,资历不够、学历不够、能力不够都有办法解决,至于品德,本是一块可塑性

最强的橡皮泥。人事任免的漏洞之大,从几年前曝光的女骗子王亚丽荣升共青团石家庄原市委副书记、市政协常委的黑色童话剧中,可见一斑,她身后那些好色“贵人”的权力之肆无忌惮,也可见一斑。

女陪练成副县级官员,是个引发人对权色媾和联想的话题,但最该深入反思的,不在于权色交易的问题,而在于权力制衡的问题。但凡一地的组织部门能独立行使调查权,“一把手”成了“几把手”,徐孟加们再怎么权欲膨胀、色欲包天,也不能轻易将一个女陪练送上副县级官员的位置。要不然,许三多、徐三多之后,还会有很多“续”三多的,谁说陪练陪乐的女子就不喜欢权力呢?

洪信良

谁把国人的脸 变成整容试验田

其实,韩国整形医生来华行医,照章办事,亦无可;不管广告如何狂轰滥炸,顶多只是涉嫌夸大术后效果,诱使顾客交易而已。根据1993年就已实施的《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必须经过注册,取得《外国医师短期行医许可证》。然而,有多少来华韩国整形医生老老实实注册、正规办证了呢?今年11月1日《焦点访谈》就曾曝光其乱象,称在京韩国整容医生多无中国行医执照。类似乱象,其实国内媒体早就屡屡曝光。

无证韩国整形医生,将中国人的脸当成“试验田”,监管部门打击便是,但是为何屡禁不止,竟然成为顽疾,“战火”烧遍全国呢?显然,监管出现了懈怠,常规式审查做不到,运动式执法自然难以扑灭整形机构的逐利欲望。

从广告常态化治理上来看,依照《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医疗机构发布医疗广告,应当在发布前申请医疗广告审查。审查广告表现形式与内容是否合法、真实不欺,是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的应有职责。整形机构,动辄吹嘘韩国专家资源,卫生行政部门就应该认真核实,查验一下广告中所称韩国专家是否经过注册、取得行医资格证。

其实,一切欺大,大都源于信息不对称。如果消费者对韩国整形专家行医资质了如指掌,又何来上当受骗?因此,卫生行政部门要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公开外籍医生包括韩国整形专家的行医资格,便于民众查询,谁能行医、谁不能,一目了然。不要等到乱象爆发,恶果酿成,记者千寻万寻,才确认某韩国专家无行医资质,已悔之晚矣。信息公开了,既方便民众自我保护,又便于举报,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最后,在行医许可证申请方面也要加大监管。已有新闻爆出,外国医师来华行医,申请许可证时存在中外信息沟通渠道不畅、申请材料难以证实真伪的情形。如何破解这一监管难题,更是任重而道远。 温江桦

尊重流浪者自由的救助更有人情味

12月4日,记者从山东省民政厅获悉,面对不同情况的流浪乞讨者,山东省尝试实施分类救助,对于不愿来到救助站的流浪者,城市将提供临时庇护所,在他们紧急求助时伸出援手。

大多数从未去过救助站的城市居民或许不知道,过去,一个流浪汉想要获得在救助站过夜资格,必须通过申请、受理、甄别、登记、入站等流程,而且只能享受最多10天的救助。期限一到,要么选择主动离站,要么被安排返回原籍,而且半年之内不得重复获得救助。

对背景复杂的流浪人员加强管理确实有必要性,但是,严寒酷暑或者疾病可没有什么时限,当这些困难“找到”流浪汉们的时候,上述规定中的一

些要求显然过于苛刻。对于如何管理流浪乞讨人员,一些救助站还存在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绝大多数接受救助的流浪汉,都会被送回原籍。这些不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定,人情味淡了些,让不少流浪汉主动放弃了接受救助的机会。在以往的采访过程中笔者就发现,一些流浪乞讨人员为了“来去自由”的生活,宁肯在街上挨冻。

对于需要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既充分尊重他们的自主选择权,又能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救助?山东省今冬的分类救助办法,以及临时庇护所的设置,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按照新的办法,出入救助站的程序不再繁琐,救助的单次时限不再只有10天,新设立的

临时庇护所尊重了流浪乞讨人员“来去自由”的意愿。

实际上,这一做法在欧美国家实行已久。比如在美国纽约,城市中存在着政府、社会组织以及社区机构开办的数千个庇护所,庇护对象也不仅是流浪人员,还有走失的儿童、遭受家暴的妇女等等。换句话说,在公共服务成熟的都市,对于困难群体的帮助不是约束管理,而是最大限度地提供方便。

可以说,今冬的流浪汉们将能享受到一个宽松的救助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管理和服务的放松。比方说,当流浪人员在极寒天气下拨打求助电话时,救助机构能否及时派出救助车,与110、120系统的沟通是否顺畅,都是生死攸关的事。 张榕博

急救车收费 不能靠家属议价

近日有网友在网上晒出一张沈阳急救中心收费单,救护车跑了9公里路程,竟有18项收费,费用高达1670元。其中救护车上所做心电图要价594元,家属表示无法接受。随后,急救中心承认多算了一倍里程,导致医护监护费多了一倍。涉事的沈阳120急救中心和平分中心,已派人前往患者家里探访安抚,并留下3000元钱。(12月3日《新华每日电讯》)

120救护车适当收取费用无可厚非,但若不顾实际的漫天要价,就有“趁病打劫”之嫌。被网友称为“沈阳最牛120急救中心”的和平分中心,虽然道了歉,退了钱,打了账单,但还没把收费依据说清楚。多算了一倍里程和治疗费用显然超标,根本不是一回事。价没有算清,理没有说明,这费用仍是一笔糊涂账。这次平息了风波,下次难免再起纠纷。

其实,救护车收费是个老问题。2012年9月,江苏新闻广播报道,扬州患者朱先生的家人重病,需要用救护车转运到上海,结账时,朱先生才发现120救护车收了他3500元,他询问收费是否有依据,被告知各地收费标准不一,很复杂。而今年3月,湖南茶陵人民医院120救护车被曝3公里收费千元,病人家属极为不满,导致价格没谈拢,最后病人救护不及死亡(3月13日《潇湘晨报》)。据媒体调查,各地救护车出车费、医护出诊费,担架费等费用,虽各有不同,但好歹有一般公开标准,但从救护车接到病人,到送往医院就诊途中的急救费用,跨地域的转送费用等,普遍没有明晰收费标准,导致疑问丛生,纠纷不断。

为了使医疗资源优化配置,救护车急救可以根据出车距离,病人危急程度,随诊人员人数,收取不同费用,但缺失了统一标准,往往就会产生议价和不同,理据不清的后果。况且急救过程中,许多设备、药品的使用,可能无法像在医院就诊那样清楚有序,家属人心切,也难免慌乱失察,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给急救车漫天要价营造了隐性空间,也为医患矛盾滋生、医保资金被滥用埋下了“地雷”。

清晰合理的收费标准,是公共卫生服务专业化、规范化的前提,也是减少“天价救护”的监督依据。120“救护车”是承载危急病人生命安全的“方舟”,其使用规范和标准越是透明细致,急救资源越能得到合理化配置,而唯有呼吁统一标准的衡量规范,打破地域限制,堵住“议价”“索价”的漏洞,才能推动相应法律体系保障的建立,为实现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做好准备。 屈旋